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4 | 7

第 1 卷第 7 期
总第 7 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2024 年学术年会在广州召开 1
“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国际会议在北航举行 3
第 62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重庆盛大开幕 7
第五届高校教务处长论坛成功举办 9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 2024 年课题管理工作会议在绵阳召开 11
第九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在兰州顺利举办 12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第二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 13
上海大学成立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 13

高教研究 15

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 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 金力 15
实现新时代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的改革重点 | 王博 18
新时代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六维向度 | 张政文 21
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 15 年：历程、现状与展望 | 王坦 梁传杰 24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何为、为何与可为 | 张小花 马焕灵 24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政策导向、现实问题与破解路径 | 马翔飞 25
从“五唯”、多维到自为：大学教育评价改革向何方突围？ | 刘振天 37
高校如何提升学术创业绩效——基于“资源—能力—环境”框架的组态分析 | 苏洋 姚建建 37
做好“四个加强”，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走深走实 | 林金辉 38

他山之石 41

美国大学如何实施择优发展的一流战略：20 世纪 90 年代马萨诸塞州的案例研究 | Barrow, C. W. 41

高教决策参考
2024 年第 7 期
第 1 卷第 7 期·总第 7 期
2024 年 11 月 22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国际一流大学学科交叉课程设置的探究与启示——以统计学与神经科学的学科交叉为例 | 邓欣依 45
国际比较视野下大学文科教育的困境与路径 | 张欣琪 刘业青 林杰 45
国外高端教育学术社团赋能博士教育发展研究及启示——以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为例 | 耿有权 李洪燕 张译丹 55
民主与科层：北欧高校学院学术治理结构和模式——基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案例比较 | 余利川 56

高教动态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2024 年学术年会在广州召开

11 月 16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2024 年学术年会——“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建设的相关重大议题研究”在广州开幕。年会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广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承办。广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吴开俊，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张应强，理事长阎光才，副理事长卢晓中、刘振天、顾建民、陈廷柱、周海涛、蒋凯，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马凤岐等出席会议，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理事，以及来自全国 120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硕博士研究生等近 600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开幕式由卢晓中副理事长主持。

吴开俊代表广州大学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该校及其教育学科的发展脉络。他提到，广州大学教育学科历史悠久，教育学院发展势头强劲，本次年会的召开为广州大学、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及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宝贵契机。他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期待能够借助年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深化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分享高等教育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从而构建更宽广、更深度的学术对话空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以视频形式发表讲话。他表示，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创会以来，一直秉持学术立会的理念，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力。这次学术年会以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建设为主题，对加快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推动应用型本科高质量发展，深化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契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需求，意义深远。希望广大高等教育学人扎根中国大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早日建成教育强国做出独特贡献。

阎光才回顾了我国 40 年来的教育变革历程和研究议题变迁，并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研究应然走向的思考。他指出，身处急剧变迁的不确定性时代，多年以来我们宏观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改革波澜壮阔，围绕政策与技术变革的前瞻性研究主题纷呈。然而在热潮过后，各种改革的效果如何，现实境况如何，教育日常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化是符合预期或是不及预期，

这些都还有待深入的探讨。他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既需要朝向实践开展宏大议题研究和指向未来的热点研究，也需要立足日常教育生活的体察，以回头看的反思性意识和审视当下的现实关怀，去关注人的处境以及心智与行为变化，并揭示背后与之关联、且持续性存在的体制性与体系化痛点、难点与堵点。

马凤岐在致辞中欢迎高等教育领域专家学者相聚在穗，并分享了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建设的几点认识。他指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民族的，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植根于具体的社会和政治经济背景，并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目标。然而，我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土壤、人类探索和认识世界规律性的普世追求以及不同民族、文化合作互鉴的需要等三方面因素决定了不能把高等教育体系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对立起来。他认为，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本在于大学对真理、正义和和平的追求，对经验、常识、逻辑、生命的信念和守护，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文明文化的相互尊重、充分交流。

本次年会共设立大会特邀报告 4 组 19 个，分会场主题报告 5 场 60 个，青年学者专题报告 9 个和博士生主题报告 53 个，会议为深入推进我国高教领域的理论品质提升与创新变革实践营造了积极空间。

张应强作题为《关于人才评价体系建设的思考》的报告。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晖作题为《从概念史看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报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作题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国模式及其向中高级阶段发展推进策略》的报告。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胡建华作题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中国特点》的报告。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黄兆信作题为《基于 1769 所高校创新体系构建的实证研究》的报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振天作题为《从反精英到泛精英：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逆向路径及其逻辑》的报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李曼丽作题为《张力与限界: “强基计划”四年追踪研究报告》的报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雷庆作题为《对工科人才评价“理科化”现象的思考》的报告。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王运来作题为《高质量教师教育助力教育强国建设——高水平综合大学“三维一体”培养研究型卓越中学教师的探索》的报告。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陈廷柱，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周海涛分别主持报告环节。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国际会议在北航举行

11 月 10 日，“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国际会议在北航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和人文公管学院、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承办。来自国内外 150 余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教育管理人员、研究生等 360 余人参加会议，共襄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学术盛会。本次会议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视频号直播平台，吸引了上万人关注。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栾宗涛，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瞿振元，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原会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沁平，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郭新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郭广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主席、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徐小洲，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王战军，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任增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吕卫锋、副校长赵巍胜，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会长秦惠民，同方知网副总经理柯春晓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来自英国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美国西北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等高水平大学的 21 位境外嘉宾现场或线上出席会议。

开幕式上，栾宗涛、李奕、郭新立、吕卫锋分别为大会致辞。

栾宗涛表示，人工智能正在开启一场比工业革命发展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颠覆性更强的教育变革。他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主动拥抱、融入、应用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教育发展全过程、研究生培养全流程，需要坚持需求牵引，加快推进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理论创新和治理实践；坚持数据驱动，全力建强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关键培养要素；坚持协同开放，拓展深化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开放合作。

李奕表示，数智技术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数字教育已成为普遍共识和全球热点“话题”。研究生教育要把握人工智

能发展的新态势，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的改革。他肯定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在推动研究生教育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智库作用，希望通过此次会议持续推进国内外高校、行业企业之间的多元化合作，加强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郭新立表示，学会始终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任务，深入实施研究生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切实以数智化转型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针对人工智能与研究生教育的融合发展，他提出坚持守正创新，把握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的变与不变；加强理论创新，引领研究生教育数智转型与未来发展；三是深化集成创新，构建全球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共同体。

吕卫锋向莅临大会的各位领导嘉宾、海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介绍了北航研究生教育发展特色与实践成果。他强调人工智能与研究生教育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趋势，迫切需要大家携手打造研究生教育数字教学新形态、数智赋能人才培养新体系、集成研究生教育数字资源。他希望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化国内外顶尖高校、研究院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加快形成“以智助学、以智助教、以智助管、以智助研”的人才培养新生态，共创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的美好未来。

大会分为主论坛和平行论坛两个单元，主论坛包括开幕式、主旨报告、大会报告、圆桌会议和闭幕式。大会分别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江浩，香港恒生大学常务暨学术及研究副校长、英国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莫家豪，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学会前会长、中华教育学会会长李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单红霞，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主任张志强，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郭广生，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徐小洲，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公管学院教授马永红主持。

主论坛单元，与会专家围绕 AI 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数智赋能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数智时代的学术流动等主题开展了 1 个主旨报告、10 个大会报告和 2 个圆桌会议。

郑庆华作了题为“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教育创新—认识与思考”的主旨报告，从研究生教育质量影响因素、AI 塑造未来教育新形态等方面分享了对 AI 赋能研究生教育创新的认识。他结合“1+N”为核心的同济大学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阐述了如何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教育创新，并强调要注重 STEM 教育，培养 AI for science 的意识和能力，

应用 AI 创设教育新场景。他提出 AI 赋能研究生教育创新的难点在于教师，AI 不能替代教师，要以人机协同的新智商超越人类自身智商的局限性。

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 Anthony R. Welch 教授以“数字时代的学术流动：多极知识世界的可能性与张力”为题，介绍了新加坡、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吸引国际学术人才的政策，指出亚洲学术人员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对现已出现的限制学术流动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数字流动具有降低成本和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潜力，但要正视当前面临的复杂多变性环境和极化趋势。

王战军作了题为“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走向”的报告，从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创新论等多维阐述了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面临的挑战，分析了数智赋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四大趋势和四大模式，提出研究生教育应从传承文化、讲授知识转向启迪思想、讲授道理，从“以人为主”的评估转向“以机为主”的评估，从研究生教育单体发展转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从国际交流与合作转向培养全球胜任力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四个转向。

莫家豪以“AI 与研究生教育：香港恒生大学的经验”为题，介绍了香港恒生大学以生成式 AI 和游戏化学习赋能跨学科教育变革的实践探索，以及研究生院与图书馆等部门之间合作开展的 ChatGPT 应用培训。此外，他提出学校将积极推进区域与国际合作，充分利用校际科研平台，致力于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开拓学生的全球视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法国欧洲教育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Jean Claude Ruano-Borbalan 教授作了题为“AI 对高等教育的变革性影响：技术会扰动教育吗？”的报告，他提出技术不足以解释教育和社会变革，而是发挥补充和增强功能，强调辩证思考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考虑数据隐私与监控、全球化影响与文化敏感性等社会伦理困境。他以艺术教育和外语教育为例，阐释了 AI 对高等教育教学与研究的影响，并对混合式学习环境创设、数字人文发展等进行了展望。

柯春晓以“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生教育“为题，分享了数智赋能研究生教育的知网探索。在教育结构优化方面，介绍了 AI 辅助学科专业布局调整、赋能学位点高效申报、赋能学位点建设与评估等内容。在研究生培养关键环节方面，分享了跨学科课程资源汇集、AI 探究式学习、学术诚信与学位论文质量把关、学情分析等应用场景。此外，他还介绍了知网在学位论文出版与传播、公益培训等方面的探索。

刘宝存作了题为“中小学教师培养的研究生化：基于中国与 0ECD 国家比较的研究”的报告，基于“我国最大规模的教师队伍能否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发问，分析了我国与 OECD

国家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中小学教师比例的差距，强调在“国优计划”实行和“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等政策背景下，要提升中小学教师学历准入门槛、探索研究生教育层次教师的培养模式、构建研究本位的教师教育模式、拓宽在职教师学历提升渠道。

德国汉诺威大学莱布尼茨科学与社会中心 Barbara M. Kehm 教授作了题为“知识社会与经济中的博士学位再展望”的报告，她介绍了博士学位的大规模生产趋势，从知识经济与博士学位之间的隐匿关系出发，阐述了学术的与非学术的劳动市场，最后分析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增加、全球大学排名和德国卓越计划、博士教育和培训对博士学位多样化的影响。

马永红以“AI 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及治理的多维审视与未来思考”为题，简述了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应用场景和典型案例，从知识观、知识生产模式、复杂系统观等多维度审视 AI 如何赋能研究生教育发展，分析了 AI 应用于研究生教育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基于此，她提出以“人本”的内核、“共治”的格局、“善治”的目标与“法治”的手段，加强 AI 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及治理。

瞿振元作了题为“人工智能与教育变革”的报告，聚焦“重估 AI”“重构教学”“重造校园”三个关键词，他提出从人工智能与社会的关系看待 AI 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角度看待 AI 对教育的影响，充分认识教育变革的深刻性；从教育治理的角度看 AI 对教育的影响，充分认识教育变革的广泛性。最后，他强调锚定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大目标，在人工智能提供的“无限的可能”中主动作为、持续改革，适应和拥抱未来智能社会。

希腊爱琴海大学实践哲学研究实验室主任 Elena Theodoropoulou 教授以“虚拟教育的挑战——走向多元现实”为题，追溯了虚拟性的哲学根源，探讨了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在场”交往形式下存在感与提高虚拟性的本质。她指出虚拟教育将削弱共存感与模糊在场感，导致“去人性化”的趋势，强调了自我呈现和相互认同的重要性。

在郭广生主持的圆桌会议一上，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帆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张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林晨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景叶教授，《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周文辉教授等国内学者围绕“数智时代中国研究生教育未来展望”，就数智化时代背景下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向、改革路径及培养策略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在徐小洲主持的圆桌会议

二上，汉诺威大学莱布尼茨科学与社会中心教授 Barbara M. Kehm，悉尼大学教育及社会工作学院教授 Anthony R. Welch，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社会背景与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 Hugo Horta，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李军，香港科技大学跨学科学院院长屈华民等国际学者从不同视角就数智时代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与转型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教师平行论坛中，40 位专家学者围绕“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理论创新”“AI 技术发展趋势及应用前景”“数智时代的人文艺术与设计”“AI 时代研究生导师角色转型”“数智浪潮下高校本研共融发展”“AI 研究生教育发展及国际趋势”中，在平行论坛 A7“AI 时代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探索”“数智时代交叉学科与学科交叉”等主题进行了分享交流。研究生平行论坛中，30 名研究生围绕“AI 赋能研究生导师角色转型”“数智时代的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教育数智化转型实践探索”“AI 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多维审视”“数智浪潮下的研究生国际流动”“AI 赋能研究生教育的挑战与应对”等主题进行了汇报。会议期间，《AI 设计作品》《国际流动专题论文》《企业支持发展》等专题海报进行了展示。

赵巍胜对本次会议进行了全面总结，肯定了本次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并基于北航国际化办学、“小航”AI 助手等实践案例，提出人工智能时代应注重更深度的产教融合，应发挥人类区别于 AI 工具在学科协同交叉上的能力，应进一步加强高校国际化。他表示，希望本次会议能够办成品牌会议，持续、充分探讨 AI 与研究生教育的融合发展问题；并期待与国内外各位专家学者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研究生教育的新型变革与跨越式发展，借助 AI 培养更具创新能力、更有国际视野、更具解决人类未来挑战问题能力的人才。

本次会议为来自国内外的学者搭建了一个跨区域、跨文化的对话交流平台，与会者会上思维碰撞，会下充分交流，反响热烈。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深邃的洞见，共同探讨了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理论、实践、技术问题以及未来发展之路，为推动全球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发展贡献了宝贵智慧。

（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员部微信公众号）

第 62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重庆盛大开幕

11 月 15 日，第 62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重庆盛大开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长级专职委员管培俊，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家俊，教育部高教司原

司长张大良，姜恩来，山东大学原党委书记郭新立，重庆大学党委书记舒立春，厦门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邬大光；监事长、吉林省委高教工委原书记、教育厅原党组书记孙维杰，监事、河北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高德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孙友宏；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武世兴，思政司副司长余先亭，学生司副司长吴爱华，科信司教育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处处长任昌山，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玉光，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徐忠波，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满开杰；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凌凡，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宴兵，副主任蒋云芳；长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显，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刘学军；学会原副秘书长、《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王小梅，副秘书长郝清杰、吴英策，学会行政顾问张文忠等出席开幕式。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李楠主持开幕式。

林蕙青指出，在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指引下，围绕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任务，按照部党组有效办实的总要求，本届高博会以“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为主题，呈现出新的亮点与特色。一是服务科技创新，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本届高博会展示了一批前沿科技产品、开发系统和操作平台，通过学术分享、观点对话等活动聚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策略路径、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全方位创新。二是服务科教融汇，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本届高博会共有参展企业近 700 家，有国内外教育信息化领域的龙头企业，也有一批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全面展示人工智能研发成果、智慧教育应用技术和信息化解决方案。三是服务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届高博会设置了高校专区和人才专区，展示办学成果，开展人才推介与招聘活动，设立对话论坛，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再上新台阶。四是服务地方发展，促进西部战略腹地建设。本届高博会设置成渝专区，通过“院士名师重庆行”“企业重点成果、技术交流”等特色活动，服务促进成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届高博会展览展示面积近 12 万平米，参展企业近 700 家，展位数 3200 个，参会企业 5000 家，参会院校 1000 余所，参会高校领导 1500 余名，参会院士近 10 名，线下参会观众 5 万余人。展览展示部分由专项展区和特色展区两部分组成。专项展区分为实验室及科研仪器设备展区、信息化及智慧教育展区、实训及机电展区、医学教育及健康展区、后勤及平安校园展区、体育设施及用品展区以及国际品牌展区；特色展区包括成渝专区、高校/科创专区、人才专区。此外，有关单位还借助高博会平台，围绕高等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举办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创新、城市与高校协同发展、深化“四新”学科建设、大中小学一体化协同育人、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等 50 余场高质量学术交流活动。

本届高博会得到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北京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兄弟学会到场祝贺。重庆市、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河南省等 20 个省级高教学会负责人出席相关活动。学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高校学生管理与就业创业工作研究分会、自学考试分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等 59 家分支机构负责人参加活动。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订阅号）

第五届高校教务处长论坛成功举办

11 月 16 日，作为“第 62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同期学术活动之一，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主办、国药励展承办、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五届高校教务处长论坛”在重庆成功举办。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李楠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教育部机关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满开杰主持。来自全国高校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教务处长、副处长等教学管理人员 400 余位代表参加。

李楠在致辞中指出，人才培养始终是高等教育的第一生产力，是高等学校的第一职责，要正确理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科学内涵，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着力高质量人才培养，持续推进本科教学改革，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他强调，教学改革一直在路上，改到深处是课程，改到痛处是教师，改到实处是教材，改的动力是学习认知规律和社会人才需求。他就加强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坚守教育教学规律，优化人才培养；二是加速人工智能赋能，推进教学管理创新；三是深化融通融合融汇，健全协同育人机制。

在上午的专家报告环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马陆亭，青岛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苗吉军，西南交通大学原副校长、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跨学科课程教学创新改革虚拟教研室主任冯晓云，吉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徐昊，哈尔滨工程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刘海波等专家，先后围绕高校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作专题报告。本环节由吉林师范大学教务处长程晓亮主持。

马陆亭作了题为“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创新引领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国家强国发展”的报告，深度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强国建设中的高质量发展、大学创新维度与高校分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苗吉军作了题为“新时代土建类专业一流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新生态的推动、全要素的驱动、四课堂的联动”的报告，结合青岛理工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理念与实践，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冯晓云作了题为“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跨学科课程设计与创新案例研究”的报告，阐述了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开展跨学科课程的重要性，以及数字化进程对高等教育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徐昊作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卓越创新人才培养”的报告，阐述了对人工智能时代开展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几点思考，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已经改变了知识的传播与获取模式。

刘海波作了题为“哈尔滨工程大学新时代‘工学’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的报告，讲述了新时代“工学”人才培养的探索过程与实践成果，以及如何对人才培养准确定位和具体实施策略。

在下午的专家报告环节，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清华大学融合式教学指导专家组副组长马昱春，江苏金智教育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教务产品规划总监高杰麟，北京邮电大学教务处处长、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学名师卞佳丽，北京理工大学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北京理工大学工业与智能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郝佳，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课程建设负责人余建波，渭南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孙宏恩等专家作精彩分享。本环节由吉林大学继续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秦川、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刘好汉先后主持。

马昱春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中的应用”的报告，探讨了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中的必要性及时代性，以及如何在课程改革、培养方案、教学方法和未来学习变革等方面，引入计算思维、人工智能指导课程和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等新举措。

高杰麟作了题为“管培融通 数智赋能”的报告，阐述了作为校园信息化平台开发建设企业在数智赋能高校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探索。

卞佳丽作了题为“人工智能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应用与实践探索”的报告，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高等教育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以及跨学科人才培养与教师角色转变的实施路径。

郝佳作了题为“本科专业知识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专业知识图谱作为一种专业知识体系的结构化、可视化、可演化新型载体的重要性。

余建波作了题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报告，阐述了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与管理现状、存在问题与实践探索，并提供了相应的改革方案与管理策略。

孙宏恩作了题为“厚植情怀、强化能力、协同育人—地方高师院校师范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与实践”的报告，阐述了渭南师范学院如何通过提升学科专业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创新措施。

本次论坛对引导高校抓住教育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切实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订阅号）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 2024 年课题管理工作会议在绵阳召开

11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 2024 年课题管理工作会议在西南科技大学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原副主任牟延林，学会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理事长、郑州大学原副校长屈凌波，分会秘书长、郑州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吴宏阳，常务副秘书长、河南工业大学纪委书记张玉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郭建如，西南科技大学副校长尚丽平，北华大学副校长杨月婷出席会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2-2024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地方大学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60 余项课题的负责人、成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参加会议。张玉安主持会议。

郝清杰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的开展提出指导性建议。他指出，课题研究要聚焦小问题，开展“大”研究，努力把每项课题打造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五个一工程”：凝聚起一支高水平研究队伍，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搭建一个交流提

高的学术平台，形成一种服务社会的工作机制，打造一个新型高端智库。他表示，希望各课题在评审专家的指导帮助下，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多出真正发挥作用的智库成果，形成本领域的学术研究高地。

尚丽平代表西南科技大学对各位专家、课题组负责人和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重点介绍了学校面向“双一流”建设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关情况。她表示，作为地方大学的一员，西南科技大学正在为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并希望能与各研究团队一起交流思想，以研究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不断提升地方大学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2024 年度“地方大学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专项课题开题环节，24 项重大重点课题负责人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组织分工、进度安排、预期成果等方面汇报了研究计划及推进方案。2023 年度“地方大学改革与发展实践研究”自设课题进行中期检查，10 项重点课题围绕主要进展、阶段成果、创新点、存在问题、下一步计划、可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了汇报。评审专家组通过审阅报告材料、听取课题汇报、提问等方式进行评议，并给出了下一步深入研究的建议。此外，专家组对 2022 年度地方大学改革与发展实践研究课题进行结题鉴定，并召开了 2025 年地方高等教育研究课题规划专家座谈会。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西南科技大学校史馆，深入调研学校服务“新三线”国家战略和绵阳科技城区域发展的经验做法，将地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调研深入结合，提高课题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使其成为真正发挥作用的智库成果。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第九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在兰州顺利举办

2024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第九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在兰州顺利举办。论坛由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西北师范大学承办，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院协办，主题为“数智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来自全国各教育博士培养高校的领导、教育博士生导师、教育博士培养管理工作者、教育博士生及相关领域特邀专家等 30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全进、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石中英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李军、卢德生、秦春生等 11 位教授先后作论坛主旨报告。

本次论坛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教育博士研究生提供了研讨交流的平台。与会代表围绕论坛主题与专题分论坛的五个专题，分别从数智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数智时代课程与教学变革、数智时代教育治理与学校变革、数智时代人才培养机制与体制变革、新时代高质量教师培养体系建设、教育博士培养模式与质量提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据悉，自 2013 年首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举办以来，该论坛已成功举办九届，为我国教育博士教育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第十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将由陕西师范大学承办。

（来源：厦大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第二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

11 月 18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公布第二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旨在发掘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具有引领性、创新性，且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的实践案例。第二批典型案例共有 32 个，案例展示视频可在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专题—人工智能观看。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希望各高校加强研究交流，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优化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

（来源：教育部官网）

上海大学成立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

11 月 20 日，在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指导下，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地中心”）和上海大学合作的“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成立仪式暨机械工程一流学科发展论坛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此次论坛汇集了来自政府、高校、企业界的多位领导和专家，共同见证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的成立，并深入探讨机械工程一流学科与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发展。

上海大学作为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和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拥

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卓越的科研实力。学校机械工程学科更是入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力。近年来，上海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国地中心是国资骨干及行业头部企业联合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中心聚焦人形机器人共性关键技术，以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为导向，汇集了“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旨在加快实现关键技术装备产业化，引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高速发展。国地中心不仅拥有先进的技术平台和研发能力，还具备丰富的产业化经验和市场资源。

在签约及揭牌仪式上，上海大学副校长张建华与国地中心总经理许彬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共同为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揭牌。蒋庄德院士、刘昌胜校长、张宏韬副主任、黎明教授共同见证。双方将在人形机器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在论坛上，国地中心总经理许彬以《产学研共创人形机器人》为题，阐述国地中心的产业和技术发展布局及对联合创新中心的展望。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副院长苗中华发表了关于《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的构思与未来畅想。之后，专家们纷纷发言、献计献策，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在本次合作中，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联合研发、产学研用无缝对接。国地中心将与上海大学进行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共同推动人形机器人在感知、决策和控制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上海大学则将依托机械工程一流学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研实力，为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件、算法开发、技术攻关等提供有力支持。

此外，双方还将共同打造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领域的学士及硕士学位的联合课程，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还将成为双方合作的窗口和新技术科研成果的中试基地和产业化基地，为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提供有力支撑。

此次合作不仅将促进双方在科研和产业化方面的深度融合，还将对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人形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正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市场价值。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的成立，不仅是对国家《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等政策的积极响应，也是双方实现共赢发展的战略选择。双方的合作将有力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创新性发展，促进

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人形机器人联合创新中心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来源：上海大学微信公众号）

高教研究

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 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 金力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在学博士研究生规模超 61 万人，正在开启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跃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持续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1981 年我国正式实施学位制度，复旦大学首批招收 22 名博士研究生。40 余年来，学校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持续改革创新，在全国率先试行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率先设置“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一级学科，全面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创设博士研究生旗舰型国际暑期学校和本博贯通“卓博计划”，实施“研究生教育博英行动计划”系列，围绕“四个面向”构建“高精尖缺”博士研究生创新型培养体系，为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近 3 万名英才，87.2%的博士毕业生投身研究研发岗位，成为国家创新生力军。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呼唤高质量博士研究生教育。复旦大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意见》精神，按照“打头阵、当尖兵”的要求，把构建一流大学创新体系作为主攻方向，秉持“需求导向，分类引领，笃志创新，造就卓越”的研究生教育理念，以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四重奏”，着力打造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重倡“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育人理念，全系统打造本硕博一体化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链

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时代使命，是实现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意见》明确要求，“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

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对人才培养尤其是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从教育概念到教育目标，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教育的底层逻辑面临重塑。落实到具体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场景，首先要破除“重使用、轻培养”等观念，把博士研究生摆到教育体系、育人场域和资源配置的中心，重树“人梯精神”，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教育理想变为现实，并内嵌转化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内容，用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博士研究生培养改革。

加强本研招生培养的一体联动。博士研究生培养需要长周期，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执果求因，从源头上千方百计发现好苗子，从研究生教育下探本科教育、从本科教育下探基础教育，从培养链上帮助有潜力的学生形成科学志趣、发展优势特长，最终走上创新报国道路。一方面按照“目标逆推”的思路，系统对标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战略部署，从造就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目标溯源，逆推本硕博一体化教育教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按照“一以贯之、各有侧重、持续进阶”原则，持续完善各阶段的培养标准、教育教学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优化本硕博贯通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机制。另一方面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及早遴选好苗子进入“卓博计划”，按照优生、优师、优培的思路，通过集中学科资源、顶尖导师团队个性化指导、国内外访学交流、班级内跨学科交流、年度进展汇报、多维度评价等，全方位提升学生成长成才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重塑创新能力导向的培养流程要素，全链条构建博士研究生自主培养体系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是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意见》从思想政治引领、改革招生管理模式、优化培养过程、完善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流程要素的革新和重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一是厘清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共性能力体系。更加突出博士研究生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以创新能力为核心培养“干细胞式”人才。二是要统筹实施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差异化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聚焦学术的高度，以知识创新为内核；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拓展专业的广度和深度，以实践创新为内核，把增强创新服务能力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作为提升培养质量的关键抓手。三是要围绕“创新力”全链条提质。在入口端，要优化招生结构，调整流程管理，推进分类选拔，强化以创

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考核，加强本研招生、学科专业优化更新的联动设计，加强招生的项目化创新。在培养端，要持续优化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及开题、中期考核等培养环节程序，构建研究生学业预警机制，探索分类发展、融通创新机制。在出口端，要修订完善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丰富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创新成果形式，试点建立高校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共同体。牵住评价改革“牛鼻子”，推动学位论文分类评价，探索交叉学科门类评价体系，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多维评价体系，打通“评价—反馈—改进”闭环。

重构科教产教协同机制，全方位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高校、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联动，融合创新，协同育人。《意见》指出，“激发科教融汇活力，激活产教融合动能，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一是要深化科教融汇。一方面要瞄准国家重大需求领域，统筹资源配置、科研组织和人才培养，完善高校与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新机制。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要打破以院系为主体培养研究生的单一模式，以“首席科学家牵头+青年研究员为骨干+博士研究生为主体”方式组成创新团队，构建起以战略需求为导向、高端科研平台为主体、高水平师资为驱动、一流研究生培养和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目标的科教协同育人新模式。二是推进产教融合创新。着眼产业和企业的未来发展需要，以课题、项目、技术攻关等为依托，加强与领军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完善企业“出题”、培养单位“答题”、市场“阅卷”的联动机制，共同设置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创新教学模式，探索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有效机制。突破传统“订单式”“接力式”培养局限，开创“划龙舟”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新范式。实施创新型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本研一体化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构建临床专博“5+3+X”培养新体系、交叉融合“Med-X”新模式和“MD+PhD”双学位教育新方案。三是深度融入区域创新体系，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复旦大学对标服务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上海市三大先导产业发展，成立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计算与智能、生物医药工程与技术、智能机器人与先进技术四大新工科创新学院，着力打造卓越工程师培养“样板间”，形成工程博士有组织联合培养的新范式。

重塑“干细胞”式育人生态，厚植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沃土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关键是引导、激励和保障青年人创新强国的内生动力。《意见》强调，“要重塑培养流程要素，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推进全链条建设培养平台，把国

家社会需要转化为博士研究生的成长舞台，打造具有产业深度、国际交流广度的育人平台，赋予学生“干细胞”式成长的空间和能力。一是打造“高精尖缺”育人平台。坚持“一学科一方案”，建设数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推进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和有组织科研与人才培养模式的融合联动，支持师生自由探索，打造鼓励原始创新的条件环境，营建卓越学术生态，构筑基础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母机”。二是落实多学科协同育人。设立学科交叉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打破学科壁垒，以系统集成各类学科交叉的创新育人资源，建立项目制学位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学生跨越现有知识结构藩篱，实现融合创新。三是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邀请国际顶尖专家，汇集国内外优秀博士研究生，打造旗舰型研究生国际暑期学校品牌，探索高水平国际交流新路径；大力推进“留学复旦”品牌建设，牵头实施“高水平高校联合考试招收培养攻读博士学位外国留学生”专项试点工作，着力打造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名片。四是加快构建以“AI”大课为引领的高校创新生态。全力打造科学智能“发动机”核心引擎，高质量构建 AI-BEST 课程体系，高标准建构 AI+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 AI 赋能千行百业探索 AI+人才培养新模式，构筑科学智能范式变革的教育和人才基座。

（《中国高等教育》2024 年第 21 期）

实现新时代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的改革重点 | 王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重要部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端，博士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集中体现，具有标志性、引领性作用。锚定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必须不断增强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主动，书写好以高质量博士研究生教育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是对“强国建设、教育何为”时代课题的精准应答。

《意见》以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为总体要求，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改革创新、开放融合”的工作

原则，围绕 2035 年建成“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的中长期目标，以及 2027 年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的近期目标，从学科专业布局、人才自主培养、产学研协同、资源配置等方面进一步明确政策导向和具体举措。

一直以来，北京大学致力于构建和完善高质量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率先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明确提出学术型和应用型研究生分类培养目标，启动实施博士研究生资助体系改革，等等。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北京大学将继续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扎实走好新时代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一是做优学科专业体系，夯实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的学科基础。《意见》将完善学科专业体系单列一部分进行论述，强调学科专业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是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的核心支柱。北京大学提出“到 2030 年，学校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顶尖学科行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的建设目标，并确定 2024 年为“学科质量年”，坚持“强化基础、深化交叉”的工作思路，巩固和维护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优质学科生态。

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为指导，以学位授权自主审核为抓手，以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为路径，建立健全以科学发展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建设机制，不断完善学科专业前瞻性布局，加大关键领域学科专业建设力度，筑牢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基础阵地。巩固基础学科“四梁八柱”，建设数理化生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发扬北大文科光荣传统，积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加快医教协同的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区域国别、涉外律师等国家急需领域培育高层次人才；充分利用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重点推进“医学+X”、区域与国别研究、“数智化+”、碳中和核心科学与技术等交叉学科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培育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提升对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和重大理论创新的支撑能力。

二是做深质量保障体系，优化全流程要素管理体制机制。质量是研究生培养的生命线。《意见》针对思政引领、招生管理、培养过程管理、导师队伍建设、评价体系等全流程要素，明确了提升博士研究生自主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内涵丰富、指导性强。北京大学始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提升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摆在首位，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结合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从“发现—选拔—培养—评价”的全过程来理解和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促进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完善研究生思政实践教育工作体系和“大思政”工作格局，进一步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完善招生指标动态调整机制，引导资源向急需领域、顶尖学科、重大项目和优秀团队配置，依托强基计划和数学英才班、物理卓越计划等特色项目，进一步探索本研贯通人才选拔与衔接；坚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培养，优化博士研究生规模结构，持续完善并严格执行博士研究生学术创新成果综合评价，健全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考核标准和评价体系，建立“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白名单”机制；继续推动培养制度改革，加强关键培养环节管理，畅通分流出口和途径，提升数智化教育水平，建设综合能力提升平台，突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整体培养质量；以资助体系改革为切入点，加快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导师遴选和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制度，强化优质资源协同配置，进一步让资源向培养成效显著的院系和优秀教师倾斜。

三是做强协同育人体系，在开放办学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见》指出要“重构”协同机制，突出表明了当前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对于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彰显了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长期致力于推进科研育人、实践育人，将继续创新和完善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加快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贯通融合。

强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平台的人才培养功能，在有组织科研攻关中激发研究生创新活力；与国家实验室等科研机构进行联合培养，积极探索资源共享、导师互聘、学籍共属、课程共建、学位联授等新模式；不断完善企业和社会出题、学校“揭榜挂帅”、产学研融合、校企地互促的组织新范式，将产业优质资源融入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促进校企精准对接、要素全方位融合；统筹做好“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篇大文章，探索与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双向交流的新机制，办好“留学北大”品牌，为提升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作出新贡献，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北京大学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更加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使命感、紧迫感，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一支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生力军，为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北大力量”，创造

更多“北大经验”。

（《中国高等教育》2024 年第 21 期）

新时代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六维向度 | 张政文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承载着生产高深知识和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双重使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基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完善学科专业体系、重塑培养流程要素、重构协同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为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从快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如何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大学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必须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建设一流大学、培养一流博士研究生的最大制度优势。《意见》强调，坚持党对博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领导。守正创新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地方党委政府应把博士研究生教育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工作整体中统筹谋划推进，强化规划引领、政策制定、评价监督、服务保障。应切实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自信，把高校党的建设放到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放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局，推动高校党的建设与博士研究生教育深度融合，把党组织的作用贯穿于博士研究生教学、科研、管理和人才培养活动的全过程，有机渗透和融合到各项工作中，为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政治保证、组织保证。

必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博士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创造高深知识，而且还要追求高深知识的实践运用。《意见》强调，坚持服务需求，更加突出国家需求导向，坚持围绕“四个面向”，不断提升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贡献度。当下，能否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与社会重大需求进行博士研究生培养结构调整，实现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目标和战略规划的同频共振，培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所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是评判博士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效的重要判据。守正创新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应以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导向，强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完善及时响应国家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建设和调整机制，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突出“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提升，鼓励博士研究生参与导师项目，不断产出“与国家发展需要丝丝相扣”的高水平创新成果。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博士培养和企业创新双引擎，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强劲的力量支撑。

必须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立德树人的成效是检验包括博士研究生教育等一切教育工作的根本标准，高校实现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体现在立德树人的成效上。《意见》强调，完善博士研究生教育“大思政”体系，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学术训练、科研实践、论文指导全过程。守正创新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应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切实发挥好思政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断挖掘其他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通过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创新，不断增强课程教学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同时，充分发挥团队育人、平台育人、科研育人作用，强化导师在思政教育中的重要职责，各自“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合力，努力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高尚道德品质、强烈历史使命感的新时代博士研究生。

必须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导师的能力素养、学术视野、指导能力、精力投入、人格魅力等因素直接影响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高水平导师队伍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意见》强调，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守正创新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应引导广大导师形成高尚师德，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不断提高学养、涵养和修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应引导广大导师练就高超师能，明确导师岗位的思政教育要求、学术水平、资源条件标准，培养导师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具备相关学科博士培养的宽口径知识储备，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教育引导能力、调

查研究能力等，乐教善教、潜心育人。应引导广大导师塑造良好师行。不仅注重言传，更要注重身教，通过务实高效的工作精神、严谨细致的科研态度、正直朴实的生活作风，成为博士研究生成长道路上的摆渡人，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

必须坚持教育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现阶段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依然面临着规模、结构、质量、效益不匹配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结构调整、内涵发展、市场需求协调统一等结构性难题，构建科学化、理性化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全方位提升博士研究生教育效能，亟须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理念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形成更强大的创新合力。《意见》强调，坚持改革创新，突出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创新。守正创新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应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建设高质量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真正让教育评价体现办学理念并产生正向指引。应处理好“的”与“矢”的关系，把博士研究生教育模式、方法创新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统一起来。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强化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育人根本成效，将教师评价改革贯穿教师的引进与培育、考评与激励、聘用与薪酬等各环节，建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强化同行评议、进行分类评价，引导广大导师更多聚焦立德树人主业，促进导师队伍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必须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大学的办学视野决定了所培养人才的视野，博士研究生高质量培养必须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对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准确把握博士研究生教育方向和发展路径、全面增强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大学必须面对的时代挑战。《意见》强调，坚持开放融合，构建国际合作新机制，塑造教育发展新生态。守正创新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应处理好博士研究生教育“内与外”的关系，形成立足中国大地和坚持国际视野相结合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机制，主动学习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有益经验，搭建高水平博士研究生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使博士研究生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方面展现更大作为。应加强与全球伙伴的互容互鉴互通，汇聚一批世界顶尖人才和一流学者，吸引海外优秀人才进入导师队伍，把中国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人才的向往之地、心安之处，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重要博

士研究生教育中心。

（《中国高等教育》2024 年第 21 期）

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 15 年：历程、现状与展望 | 王坦 梁传杰

在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设置 15 周年之际，全面认识其改革的历史进程、内在机制与发展方向等问题，对促进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的分析框架，认为中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经历了酝酿奠基、试点实施和全面推广三个时期。在这过程中，它遵循着特定的改革机制。这种机制固然有其优势，但现阶段遇到了困境：三个主体的位置有待进一步理顺，强制力和诱导力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路径依赖的窠臼有待进一步突破。展望未来，教育行政部门、教指委和培养单位三主体需各就其位，凝聚改革最大合力；既要增强强制性改革的强制力，又要提升诱致性改革的诱导力；坚持连续性渐进式改革，推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关键词：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历程，现状，展望

(《中国高教研究》2024 年第 9 期)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何为、为何与可为 | 张小花 马焕灵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聚焦于解决“何为、为何与可为”三问。本质上而言，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遵循知识—制度—组织三重逻辑向度。其中，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以知识生产、知识分类、知识演化为理论原点，以教育法律法规为代表的规制性要素和央地政府颁布研究生教育政策等规范性要素为工具支撑，以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实践共同体为外驱动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经济社会和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功能价值和本体价值。未来，我们应建立价值共识—工具赋能—组织保障三维实践进路推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其关键在于明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功能定位、形成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推进机制、成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管理机构。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学术型学位，专业型学位，逻辑

（来源：《研究生教育研究》微信公众号）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政策导向、现实问题与破解路径 | 马翔飞

摘要：研究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先锋力量，研究生导师影响着研究生的成才方向和发展品格。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国家政策层面对于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不仅应传授专业知识，更承担着塑造学生品德、价值观和职业伦理等重任。但在实践中，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导师对立德树人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不够重视，研究生对师德师风的期待与现实存在落差，教育对象个性化发展与立德树人价值导向存在兼容挑战等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了系统的破解路径：进一步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提升导师育人水平；持续推进师风师德建设，整治不正之风；完善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机制，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关键词：研究生，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

导师制是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教育制度，要求导师不仅指导学生学习，而且指导学生学校生活。从世界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看，19 世纪德国教育家威廉 • 冯 • 洪堡的“教研合一”思想强调高校不仅要传授现有知识还要创造新的知识，这种思想催生了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受当时欧洲行业行会模式的影响，研究生教育仿照行会学徒式模式进行，在此之后，导师制始终是研究生教育的主流模式。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逐步建立和完善学位授予制度，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在最初的研究生导师制度安排中，研究生导师主要负责对研究生进行学术指导，思想政治及德育工作主要由教学秘书、教辅人员或辅导员完成。然而，研究生导师制的体制设计将研究生与导师从研究生报考、培养到毕业的整个学校教育过程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研究生导师成为研究生理应接触最多的教师，也是影响最大的教师。然而，研究生导师违规、失范甚至违法犯罪的事例依然经常见诸媒体，严重损害了研究生导师的群体形象，对研究生导师的育人效果带来了不良影响。教育部 2018 年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明确指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要以立德树人为首要职责，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率先垂范的卓越姿态自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工作，分析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政策要点和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究研究生导师落实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路径，显得必要而迫

切。

一、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政策导向

德才兼备是人们对人才的美好祈求，也是教育者孜孜以求的育人目标。随着科技日益发达和个体教育层次不断提升，“有才有德成大事，有才无德坏大事”将愈演愈烈。研究生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研究生品德的高低决定着其对人类社会贡献的正负及大小。作为研究生法定关系最为密切的教师，研究生导师影响着研究生的成才方向和发展品格，“在研究生的学术发展方面起主导作用”。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对研究生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多次发文划定导师权利、规范导师行为、激发导师教育活力。新时代以来，教育部关于提升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工作要求的文件主要有两个。

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教研 1 号文件《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把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明确为立德树人。《意见》对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提出了如下具体要求：“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意见》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七项职责，具体包括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范、优化研究生培养条件、注重对研究生人文关怀等七个方面。“四个坚持”和“七项职责”为研究生导师指明了立德树人具体的实践向度。

《意见》关于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上述要求对推动研究生教育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有利于强化研究生培养的育人导向。《意见》强调立德树人在研究生培养中的核心地位，明确将德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引导研究生导师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技能，更要关注研究生的思想道德、学术诚信、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质的培养，这有助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确保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与内涵。其二，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意见》强调了对导师违反立德树人职责行为的监督与惩处机制，严明师德红线，坚决杜绝学术不端、有偿代写论文、对学生进行不当干预等行为。这有利于净化学术环境，维护教育公平，保障研究生的合法权益，树立良好学术风气。其三，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意见》的出台是对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的深度探索，旨在打破传统的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培养模式，转向更加注重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培养。这有助于我国研究生教育进一步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引导研究生教育持续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教研 12 号文件《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基础上，根据研究生教育特点，针对导师指导行为，从坚持正确思想引领、科学公正参与招生、尽心尽力投入指导、正确履行指导职责、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把关学位论文质量、严格经费使用管理、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等八个方面制定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 8 条行为准则，规定了研究生导师“十不得”，对导师指导行为提出具体要求，明确基本规范。《准则》明确指出，要强化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既做学业导师又做人生导师。进一步强调了研究生教育中立德树人的核心地位，为导师行为划定底线、设定红线，即坚决维护导师基本权利，又严格强调导师履职尽责，引导形成宽严相济的导生关系。

《准则》虽不是关于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专门文件，但《准则》强调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求导师不仅关注学生的学术成长，还要注重其品德修养、心理健康与全面发展，这促使导师在指导过程中更加注重价值观引领、人格塑造与社会责任感培养，丰富和深化了研究生教育的育人内涵。《准则》对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导师指导行为、改善导师育人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准则》要求导师合理调整指导研究生的数量，确保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提供高质量指导。这一规定有助于防止导师过度负荷，保证对每位研究生的个性化指导，从而提升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质量和效果。其次，使导师履行立德树人职责有规可依，为导师在日常指导工作中如何落实立德树人职责设立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和操作指南，有助于统一导师群体的认识，提升其在道德、学术、情感关怀等方面的自我要求，确保指导行为的专业化、规范化。最后，《准则》明确划定了研究生导师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的行为底线，如不得有违反学术道德、损害学生权益等行为。这有助于强化导师的职业道德意识，遏制不良行为，净化育人环境，提升整个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师德师风水平。同时，《准则》也关注维护导师应有权利，旨在改善导师的治学育人环境，激发其育人育才的积极性。通过制度层面的保障，导师能够获得必要的工作条件、学术自由以及合理的评价与激励，从而更专注于指导工作，提高指导效果。整体来说，《准则》的发布与实施，对于规范导师行为、强化立德树人、构建和谐导学关系、保障导师权益、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环境的持续改善与健康发展。

可以看到，立德树人始终处于两份文件中的核心地位。立德树人强调的是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导师在研究生德育工作中的职责，确保立德树人不仅扎根于理念层面，而且通过具体指导

行为和制度保障使其得以有效实施。而《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则明确要求导师坚持正确思想引导，从八个方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立德树人理念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化落地。认真学习领会以上两份文件，可以从中提取到三个关键词：一是导师职责，两份文件都明确了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和责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学术指导、科研训练、职业规划指导、心理关怀等多方面。导师需要全面负责研究生的学术成长、个人发展和心理健康，确保研究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得到全面而均衡的发展。二是师德师风，导师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遵守学术规范和道德底线，保持学术诚信，在科研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学术伦理规范，包括诚实守信、尊重知识产权、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导师负有教育、监督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的责任，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氛围，要以自己的行为为学生树立正面榜样，包括科研态度、工作方法、团队协作等方面。三是培养质量，两份文件都强调了导师在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的重要性。导师应通过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法、严格的学术训练、合理的项目管理等方式，确保研究生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职业素养等达到国家和学校规定的标准，并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和科研项目的完成情况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同时，文件强调了导师应避免滥用权力或过度干涉，促进师生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共同营造有利于知识传播、学术探索和人才成长的导学氛围，引导形成学术从严的学术氛围和具有人文关怀的生活氛围。这些政策要领为导师职责落实、师德师风建设和培养质量提升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研究生导师践行立德树人职责存在的现实问题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研究生导师肩负着立德树人的职责，无论制度是否有相关规定，都应承担起学术育人和道德育人的双重重任。但在现实的教书育人实践中，个人认知的肤浅、职责任务的多重、腐败风气的侵蚀等使得不少研究生导师的育人之道与立德树人职责大相径庭。同时，研究生对导师的期待以及个性化发展要求也对立德树人工作带来了多方面挑战。

（一）研究生导师对立德树人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不够重视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理想发展状态的理论勾勒，也是终极性的、完美性的价值目标，它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提供了清晰的判断标准和方向指引。从“立德”的角度来看，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具有以德育为引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义务，但部分研究生导师

认为，教育和科研训练是其职责主体，研究生德育及劳动教育、心理教育等其他工作是专职思政教师或负责学生工作教师的任务，不仅忽视立德树人职责，更是对导师“第一责任人”定位没有清晰认知，调研显示，“只有 61.3%的导师“认同”自身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人，有高达 80.6%的导师认为研究生德育的责任主体依次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75.0%）、院（系）党组织书记（63.9%）、辅导员（58.3%）、导师（38.9%）”。此外，国家、地方和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文件中虽然大都提到了研究生导师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修养，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落实立德树人职责的具体任务和方式，需要研究生导师自行探索育人方法，这使更多研究生导师不明立德树人该如何落实。另外，我国现有的研究生导师多数不是师范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毕业，很少受过专门而系统的专业师范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很难恰如其分地把握立德树人的深刻意涵，在育人方法上多数采取会议学习或放任不管的方式，很难做到融育人于专业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导师立德树人主体责任缺位，缺乏投身立德树人行为实践的驱动力，甚至还会导致导师在日常科研生活中言传身教的缺位。

从“树人”的角度来看，研究生导师必须重视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但因部分导师存在知行上的偏差从而影响育人成效。一方面，随着职业竞争加剧，研究生导师不得不把科研当作第一要务。但不断为自己的科研工作加码，必然会影响人才培养工作，因为研究生导师“担负着教书和育人两大职责，教学科研工作任务繁重，客观上让导师感觉无暇顾及德育工作”。另一方面，为了完成导师个人的科研任务，额外增加研究生的科研工作量势必会导致研究生科研劳动“异化”。有学者经统计研究指出，“有的导师受到利己主义的影响，追求谋取私利，在指导工作中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动机的主要动力源泉，产生‘利己而导’的行为”成为一种典型现象。对于立德树人，很多研究生导师在认知和行动上与其本质内涵及教育部的要求存在较大偏差。其一，在科研分工中导师的主导地位与功利化倾向易造成研究生科研工作“异化”。在赵丽文、林焕翔的统计中，一定比例的研究生与导师爆发过冲突，更有学生表示，“很多时候学生都将自己视为‘受雇佣的打工人’”“我们实验室‘996’，每天打卡上下班，对此大家都挺不满，对老板也是能躲就躲吧”。育人的功利化倾向导致了部分导师在育人过程中把自己晋升职称、评奖评优、申请项目或完成项目等事情放在第一位，因而会把科研“异化”为压迫学生的力量，使得导生矛盾不可避免，更何谈立德树人。从人的全面发展视角来看，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导生关系矛盾，大多存在着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诉求与导师考评体系中结果导向之间的矛盾。“导生关系在物质层面也表现为

生产劳动关系”，在日常科研和学习中，研究生对于导师“老板”的称呼体现出部分导生关系呈现出一定的雇佣性质，与雇佣相对应的是剩余价值的产生，这种不正常的导生关系必然会进一步加剧研究生科研劳动的“异化”。

（二）研究生对导师师德师风的期待与现实存在落差

学术育人是研究生导师联系研究生的主业，体现着研究生导师的道德品质，影响着研究生的身心发展。研究生导师既是研究生学术的引路人，也是研究生品格的影响者和教导者，研究生导师长期与研究生共同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导师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作风等往往会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大多数学生的心目中，研究生导师代表了其所在学科的学术高度，并会不自觉地把这种评价迁移到道德评价中，自然而然地对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及其学术水平产生多维度的期待，但现实中部分研究生导师的错误行为与学生的高期待之间具有较大落差，不仅影响了研究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更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对研究生的培养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首先，导师人格及形象迁移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人格具有道德含义，是经过学习、工作等经历后逐渐形成的个人较为稳定的特质，在学生阶段和工作阶段往往会有所改变，甚至差异较大。高尚人格的形成往往需要道德主体强大的自律力，道德模范的力量会起到重要作用。研究生导师一般都比较优秀，经过遴选而获得资格，是高校众多教师之中的佼佼者。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心目中的地位一般都比较高，部分研究生对自己的导师有崇拜心理，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偶像，导师人格及形象会通过日常的言传身教对研究生产生影响。其次，研究生导师在学术方面的造诣较深，一般都有较丰硕的成果，这使其在学生心中形成高大人格，成为研究生尤其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尊敬的对象。再次，研究生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制度关系使研究生导师成为研究生自大学以来最为亲近的教师，一对一指导使研究生有机会近距离体会导师的学术修为和性情涵养，研究生导师居高临下的身份和地位使师生之间人格及形象的迁移呈现为单向流动，导师通过外显或内隐的指导活动对研究生人格产生影响，大多研究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导师潜移默化的辐射和影响。

导师人格及形象迁移的特殊作用要求研究生导师时刻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运用端正之身立德树人。然而，却有部分研究生导师在学术育人的主业上存在道德错误。有学者研究认为，导师不正当“使用”学生、导师压制学生发展、导师过分干预、导师教育长期缺位、导师性侵骚扰、导师剽窃学生学术成果、导师殴打辱骂学生、学生威胁利用导师、学生不服从教育

管理等 9 种问题是导师或学生对自身教育管理权、发展权、隐私权、教学管理义务、受教育义务等某方面权利的滥用和义务履行的缺位。具体表现为有的研究生导师认为研究生协助不好自己的科研工作，甚至还会添乱子，于是只管自己忙自己的事务，对研究生学业不管不问，放任自流；有的研究生导师在指导研究生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过分看重自己想要的研究结果，引导学生投机取巧或伪造数据，甚至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还有的研究生导师在与研究生合作研究的过程中，过分施压逼迫研究生超负荷工作，并将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在研究生导师中，道德败坏者虽然极少，但不可小觑。因为他们都在侵蚀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机体，损害着研究生导师的群体形象。

（三）教育对象个性化发展与立德树人价值导向存在兼容挑战

研究生年龄大多处于 22 岁至 30 岁之间，身体及其生理机能均已成熟。但是，心智和人格的成熟与个体的年龄并不成正比，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只有为自己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个体需要树立起为人民事业奋斗的志向，经历过各种实践的磨砺才能逐渐达到心智与人格的成熟。由于多数学生是从本科直接读上来的，一直没有走出过校园大门，从未正式入职到社会部门或单位工作，因此，大多研究生的心智和人格还未经锻炼而成熟。基于此，立德树人工作之于研究生群体整体呈现出“一定社会发展的要求同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之间的矛盾”。

高校扩招以来，1998 年至今我国研究生招生从 7.25 万人增至 124.25 万人，在学研究生从 19.88 万人增至 365.36 万人，毕业研究生从 4.71 万人增至 86.22 万人，研究生群体虽然急剧增大，但研究生群体形象的社会认同程度并未同比增长。一方面，在人们眼中，研究生是学历最高的人才，理应是创新能力和道德水平的社会标杆，承担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与之相对应，研究生群体对于其个人的发展有较强的主观判断，对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较强，由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代际差异，“研究生在学术发展、职业规划等关键问题上难以与导师产生认同”已不再是个别现象。有研究指出，“研究生主体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研究生在导生关系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大，这使得研究生个人的个性化发展诉求不再是只能埋没于内心，而可以诉诸实践。另一方面，一些研究生导师因受到各种考评压力，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科研上，而不是放在学生成长上，很难分出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立德树人的方法、提升自身的育人能力，对于如何引导学生把学习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更是感到迷茫。总体来说，研究生导师群体“育人能力供需之间不相匹配所产生的差距造就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之间亟待跨越的巨大障碍”。

研究生群体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导致的个性化发展需求与导师育人能力供需失衡形成了一对较为显著的矛盾，导致立德树人效果大打折扣。

三、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现实问题的破解路径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的实施主体，落实立德树人职责必须激发研究生导师的内在动力。促进研究生导师自觉主动地立德树人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研究生导师及其高校要遵循教书育人规律、学生成长规律，在分析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重构认知、行为、监督及奖惩体系，全面落实导师在立德树人过程中的首要责任和关键作用，探索有效推进职责落实的路径。

（一）进一步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提升导师育人水平

立德树人是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议题，旨在深化教育内涵，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立德树人是新时代赋予研究生导师的神圣使命，要求导师在知识传授之外，更加重视学生品德修养、价值观念的培育，引导研究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落实这一职责，关键在于导师要明确自身首要责任人定位、明晰自身育人职责并自觉把德育寓于科研教学中，做到不仅传授专业知识还要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致力于培养既有深厚学术功底，又具备高尚道德情操、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1.研究生导师要明确首要责任人定位

在现行研究生教育体系中，导师对于研究生的直接影响最大，不仅是专业知识的引路人，也是学生品德塑造、价值导向的领航者，具有不可替代性。导师应深刻理解自身职责的广度与深度，覆盖学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职业规划辅导及心理健康关怀等多方面，自觉屏蔽部分导师关于立德树人的“无关论”“无用论”“无暇论”，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非单纯的知识灌输。研究生导师作为首要责任人，需全方位介入研究生的成长过程，以高度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培养兼具学术造诣与良好品德的高层次人才，确保研究生在智力与人格上均衡发展。

2.研究生导师要明晰立德树人的具体责任

明确目标方晓努力方向，明晰责任才知具体作为。研究生导师一要主动学习领会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的精神要旨，对照检视自己以往研究生指导行为，开展自我批评，坚定地确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二要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结合

所在培养单位和所培养研究生的实际，制订个人落实立德树人的责任计划，在与学校、学院和研究生的研讨中进行完善；三要将自己所订的立德树人责任计划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在指导研究生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地予以修正和补充。同时，导师应身体力行，强化科研诚信与伦理教育，树立正面榜样，培养研究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适时提供心理支持或指引，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在此基础上，导师还需不断自我提升，更新教育理念与方法，通过反思与评估，持续优化指导策略，以适应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3.研究生导师要将德育寓于科研教学之中

科研与教学是研究生导师施教的主要阵地和平台，导生关系中的情感交融主要围绕着学术研究中的对话与合作展开，研究生导师要努力将德育寓于科研和教学之中。首先，导生双方在科研实践中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坚持研究“真”问题，勇于研究“卡脖子”问题，将导生个体的私利融于社会公利的实现之中，把社会公利与个体私利相统一，将导师和研究生的利益融通于国家公利共创的科研活动中，“通过对社会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来彰显以义为利的意义追寻”。其次，研究生导师要善于在科研和教学中设计相关德育的切入点，使德育的介入及讲解既不可或缺，又恰如其分。研究生导师要注重德育知识及理论的系统性，通过讲解使研究生能够获得整体性认识，而不仅仅停留于某一个片面或细节的一知半解。不仅如此，研究生导师还要恰当援引比较新的例子进行分析，使研究生能够生动地感受到哪些应该学习和发扬，哪些需要避免和抵制。

（二）持续推进师风师德建设，整治不正之风

近年来，研究生实名举报导师的案例反复出现，严重损害了研究生导师群体形象，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回应社会期待、维护学术尊严的重要体现。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各界对高校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的道德品质与职业操守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及时纠正导师在立德树人中的知行偏差，杜绝导师学术育人中的道德错误，建立惩罚机制和监督举报通道，确保每一位导师都能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以高尚的师德影响和带动学生，是破解立德树人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1.导师要及时纠正立德树人中的知行偏差

知行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强调理论知识与实际行动的统一，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工作是个体性极强的实施行为，必须学会及时纠偏以保障认知和行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知行偏差可能表现为其自身虽然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在实际研究和教育工作中缺乏诚信、责任意识淡薄。这些问题若不及时纠正，将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及整个学术生态的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其一，导师应具备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在繁忙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导师需定期进行自我审视，诚实地评估自身在道德修养、学术诚信、师生关系处理等方面是否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其二，研究生导师要勇于打破囿于师门的狭隘道德见解，在立德树人中胸怀高尚的知行尺度，依据优秀的知行标准，定期反省自己的知行作为，充分认识自己的知行不足。其三，研究生导师要敢于知错就改，及时针对自己认知和行为上的偏差或不足，予以纠正、弥补和改进，以“身正”影响学生，形成良性循环。总之，只有导师自身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出既具有深厚专业知识，又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新时代人才。

2.导师要坚决杜绝学术育人上的道德错误

学术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研究生导师要避免在此过程中的一切可能性失误或错误。其一，研究生导师要认真学习国家科教部门、地方科教部门和所在高等院校的各级学术规范，时刻遵守学术规范，不剽窃，不作假，以身作则，在学术研究上做好研究生的楷模。其二，研究生导师要制定严格的师门学术规范，经常向研究生宣讲，动员研究生相互监督，及时举报，以严谨的内部防范机制将学术道德偏差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三，研究生导师要及时发现研究生学术研究过程中急功近利的投机取巧行为，严把实验、调研、数据分析和论文发表关，对出现学术道德偏差的研究生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促使其回归学术规范。长此以往，研究生导师可以通过学术育人，有效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3.建立惩罚机制与监督举报通道

整治不正之风是保障学术环境纯净、促进科研诚信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学术不端、师生关系异化等问题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学术界的公信力和教育的纯洁性。对此，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同时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机制，确保导师队伍的清正廉洁，为研究生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积极向上的学习和研究环境。这不仅是对学术诚信的坚守，更是对师生关系纯洁性与学生权益的有力保障。首先，惩罚机制的设立，旨在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这包括但不限于学术不端、对学生进行不当指导或压迫、性别歧视及任何形式的骚扰等行为。通过明确界定违规行为的具体标准及对应的处罚措施，如警告、暂停招生资格直至取消导师资格等，可以确保每一项判决都有据可依，公正

严明。这样的机制不仅能够及时纠正不良行为，也能警示其他导师，促进整体师德水平的提升。其次，监督举报通道的建立，则是为了改变发现问题难、举报渠道不畅的现状。这一通道应当是实名与匿名结合的、安全且高效的，以确保举报人免受各种报复。它不仅应包括线上平台，如专门的网站或邮箱，也应保留线下举报的方式，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重要的是，对于每一起举报，都应有独立、专业的机构负责调查核实，并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前提下，公开处理结果，以此彰显制度的透明度和执行力。同时，为保证惩罚机制与监督举报通道的有效运行，还需定期对相关政策进行评估与调整，确保其与时俱进，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总之，建立健全的惩罚机制与监督举报通道，是研究生导师队伍师风师德建设的重要一环，它不仅关乎学术生态的净化，更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

（三）完善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机制，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任。因此，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推动科技进步、服务社会发展的关键举措。这要求我们从多方面入手，高校既要建立动态机制奖励立德树人榜样，又要构建研究生导师再教育机制持续提升导师队伍水平，还要进一步完善以立德树人为核心职责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体系，以期达到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研究生的目标。

1.高校要建立动态机制奖励立德树人楷模

为保证研究生导师做好以德育人，高校要建立动态机制予以促进。首先，要合理而科学地量化以德育人的标准，建立强化以德育人效果的新考核指标体系，引导研究生导师投入时间和精力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其次，要定期考评研究生导师的立德树人工作，不仅听取导师们的汇报或审阅其汇报材料，而且听取研究生的个人和群体意见，综合多方面因素考量之后对研究生导师予以奖或惩。再次，要建立校、院、系（所）联动的研究生师生关系预警机制，及时处置研究生师生关系不良事件，对事态严重、性质恶劣的违法当事人适时移交司法机关，确保研究生师生关系风清气正。科学合理的动态机制将促使愈来愈多的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立德树人之中，促进更多理想远大、思想高尚、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俱强的德才兼备研究生涌现。

2.高校要构建研究生导师再教育机制持续提升导师队伍水平

为了完善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机制，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高校必须构建起研究生导师再教育机制，持续提升导师队伍水平。构建导师再教育机制，意味着要定期对导师进行教育

培训，内容不仅涵盖学科前沿知识的更新、教育理念的现代化以及高效指导方法的学习等，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持续强化研究生导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实践，确保导师队伍不仅在专业知识上传道授业，更在思想政治上引领示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中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指示导师需准确把握教育的根本问题，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因此，构建导师再教育机制，首要任务是深化导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理解，提升其政治站位，使其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与践行者。通过定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班、研讨论坛以及“四史”教育培训，导师们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融入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这不仅是对导师个人信仰的加固，也是对学生进行有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持续强化研究生导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是构建高质量导师再教育机制的关键一环。通过这一机制，高校能够打造出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深厚、情怀深邃、视野开阔的导师队伍，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3.高校要构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协同育人机制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浪潮中，为了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高校必须构建起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协同育人机制，这是对教育本质的回归，也是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这一机制的构建，旨在通过多维度、多层面的协同作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立德树人格局。首先，协同育人机制强调的是教育主体间的紧密合作与互动。这不仅包括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管理等部门之间的联动，还应扩展到家庭、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通过建立多方参与的育人平台，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到研究生的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人格塑造中，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其次，该机制重视教育过程的全链条设计。从招生选拔开始，就应将德行考察纳入考量范围，到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的构建、实践教学的实施，直至毕业评价与跟踪反馈，每一个环节都要体现立德树人的核心要求，确保研究生在学术探索与个人成长的每一步都受到正确价值观的熏陶和指引。再次，协同育人机制还意味着教育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丰富思政教育资源，使立德树人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加具有时代感召力。同时，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培养，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和人文素养，培养其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最后，构建评价与激励机制也是协同育人机制不可或缺的一环。建立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不仅评价学术成就，更要考察研究生的思想品德、社会责任感和实际贡献，以此为导向调整培养策略，激发师生的内在动力。

(《研究生教育研究》2024 年第 4 期)

从“五唯”、多维到自为：大学教育评价改革向何方突围？ | 刘振天

摘要：作为大学教育评价改革的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破“五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多维评价日益成为新的教育评价目标模式。然而，由于“五唯”评价固有的形式化、简约化和计算化等特点，在评价改革实践中，多维评价仍难以替代“五唯”评价，而只是“五唯”评价的补充角色。而且，多维评价受价值、方法和技术等因素影响，操作难度大、成本高。从“五唯”评价到多维评价并非教育评价改革的最佳和最后选项。大学教育评价只有转向从根本上体现学校、学者及学术主导的“自为”评价，即自我评价，才可能真正走出“五唯”评价怪圈，有效建立符合教育规律和评价规律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大学教育评价体系，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关键词：大学教育，教育评价改革，“五唯”评价，多维评价，自为评价

（《大学教育科学》2024 年第 5 期）

高校如何提升学术创业绩效——基于“资源—能力—环境”框架的组态分析 | 苏洋 姚建建

摘要：基于“资源条件—动态能力—外部环境”整合性分析框架，以我国 41 所双一流大学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揭示了提升学术创业绩效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构成高校学术创业绩效提升的必要条件，高学术创业绩效是多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实现高学术创业绩效有四种路径，分别是资源禀赋型、体制机制创新赋能型、优势学科依托下制度激励型、全面协同型；在特定条件下，不同前因变量可以通过等效替代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高校学术创业绩效。立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校应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建立与有组织科研相适配的资源配置机制，培育动态能力，并根据自身特色选择差异化的学术创业提升路径。

（来源：湖南师大教科学报微信公众号）

做好“四个加强”，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走深走实 | 林金辉

日前，云南财经大学中英合作硕士教育项目办学二十周年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昆明举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教授应邀出席，并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本微受权全文发表本次致辞讲话稿。讲话稿经作者删节、修改、审阅。

尊敬的倪慧芳会长、高朝寿巡视员、陈红书记，各位代表、朋友们：

很高兴来到美丽的春城，与各位新老朋友共同回顾中外合作办学不平凡的历史，展望中外合作办学美好的未来。首先，我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对本次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中外合作办学是唯一以高于部门规章的国务院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范的涉外办学形式，也是我国教育唯一涉外行政许可事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培养了大批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国际化教育需求，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高校学科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全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 2500 多个，其中本科以上办学机构和项目超过 1500 个。2018 年 9 月以来，经教育部批准设立和举办的本科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 473 个，包括 2 所合作大学，119 个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352 个项目，涉及境内 346 所高校与境外 34 个国家和地区的 420 所高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毕业生已有 200 多万人；在校生规模共约 76 万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刚刚胜利闭幕不久。这两次重要会议对教育开放和中外合作办学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明确要求。学校以“携手同行 • 创新发展”为主题举办论坛，研讨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三中全会和教育大会精神，推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进云南省高水平教育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下面，我就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路径问题提出几点个人看法，和大家共同进行学术交流。

一、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的认识和宣传

中外合作办学有明确的政策界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明文规定的，在座各位对此十分明确，不必多说。然而，我们与外方高校谈判的老师，我们招生的老师，遇到的可能就是对中外合作办学知之不多甚至是知之甚少的群体。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办学协议谈判不成或者草率签订；可能导致考生及家长对合作办学产生误解而影响在办项目的学生报考和录取。与此同时，在申报设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材料中缺少应有的法律要件，在评估的材料中体现不了依法依规规范办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我们要研究如何使合作办学者、学生和家长乃至于部分媒体记者进一步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界限，这是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的把握和运用

中外合作办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办学过程中，规律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你一旦违背了规律，它就要惩罚你，它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的。规律可以为人所认识、掌握和运用。整个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归结起来就是对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2010 年 8 月 27 日，我在《人民日报》首次提出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并作了明确的表述。我是这么说的，中外合作办学最基本的规律有两条：“一是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二是中外合作办学必须适应和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必须根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和对自己的合理定位，提出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引进、有效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包括课程体系、教材、教学理念、教学管理制度、考评方法、师资队伍等；通过不断改革课程与教学，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外合作办学其他规律，如管理规律、教学规律、教师成长规律等等都是由基本规律派生出来的。如今，中外合作办学两条基本规律已被中外合作办学相关学校、社会广泛接受，在政府、高校的文件中也能看到它的“踪影”。

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和其他下位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为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政策支撑。

三、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办学主体地位的认识和作用的发挥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建设过程的不断推进，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逐步增强。面临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新形势，高校应不断强化办学主体意识，把改革和发展的重点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前，有的高校已在提前谋划学校的“十五五”规划。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应不断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把中外合作办学放在学校国际化发展全局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划，把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学校学科专业布局的着力点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区”加以统筹推进。根据中外合作办学特点，给予校内办学机构和项目在人事安排、财务管理等办学条件必要的保障；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坚持体现中外双方共同设计，融合创新，反哺中方母体高校的原则，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化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核心地位。

中外合作办学涉及学校方方面面，涉及国际合作交流部门、财务部门、教务部门、科研部门、人事部门、学生管理部门，也涉及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等。如果把申报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当成是“相关学院的事”、一个部门的事，很难想象与外方谈判、材料准备能有高质量；同样，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也不是靠一个部门孤军作战能完成的，必须是“一把手工程”，需要“举全校之力”。

四、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

中外合作办学涉及中外，政策性、专业性很强。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的发展。几十年来，中外合作办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积累的经验需要总结凝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使之可复制、可推广，使之促进具有中国特色合作办学知识体系的完善和成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提升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当前，中外合作办学面临新的发展环境，要聚焦实践中迫切需要研究的新问题。例如，要聚焦：中外合作办学学科专业、层次布局优化研究；与教育强国相匹配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体制机制研究；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国际合作科研平台建设研究；中外合作办学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增强国际影响力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招生、学生支持体系与高质量就业研究；中外合作办学招收外国学生的研究；中外合作办学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研究；中外合作办学分类评估与专科层次评估方案设计研究，等等。

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二字很值得珍惜。科学研究工作者包括中外合作办学一线的管理人员、教师和理论工作者。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学科建设设想的提出，到科学研究重要性共识的形成，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蓬勃

发展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在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下，中外合作办学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科学研究必须面向活生生的、火热的中外合作办学实践，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针对性、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撑和理论支持。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云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已经走过了 20 个春秋，是风华正茂的“成年人”。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科学研究战线的老兵，20 年间我五次来过学校；每次来，都高兴地看到了新的变化，看到了新的发展。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过多个培养周期的考验而逐步走向成熟，证明她是可持续的，有质量的。这些变化和发展来之不易，凝聚了许多人的汗水和心血。我想借此机会，对为云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取得成就作出积极贡献的领导、老师和同学致以崇高的敬意。

云南财经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单位。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全国性组织，研究会将一如既往支持和推动包括云南财经大学在内的云南省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高校开展学术活动和课题研究，为在滇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优质咨询意见和建议，协助培养中外合作办学管理人才队伍和理论研究队伍，服务好云南省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

最后，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来源：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他山之石

美国大学如何实施择优发展的一流战略：20 世纪 90 年代马萨诸塞州的案例研究 | Barrow, C. W.

Barrow, C. W. (1996). The strategy of selective excellence: Redesigning higher education for global competition in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Higher Education, 31(4), 447−469.

Clyde W. Barrow：德克萨斯大学里奥格兰德河谷分校政治学教授

摘译：张书歌（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蒋林浩（华南师范大学教师

教育学部副研究员）

校对：沈文钦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在面临财政危机和新经济挑战时的应对策略。新经济秩序背景下，美国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受到财政危机的限制和商业、政治的压力，因此“必须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择优发展战略，成功化解了这一矛盾。择优发展战略旨在借助进一步区分各个机构的使命，取消与使命无关的项目，将研究活动转移到跨学科的应用研究上，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更合理化，从而能够更适应新经济秩序的挑战。作者通过例举马萨诸塞州公共高等教育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择优发展战略在实践当中的应用前景。

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美国高等教育在后工业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资源分配面临困境。美国高等教育不仅受到结构性财政危机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商业和政治领袖的压力，要求大学适应新经济秩序的挑战，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

除此之外，他们也面临着全球经济竞争复兴和产业结构转变的严峻挑战。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被削弱，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竞争力下降。对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的关注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又一挑战。美国劳工部 1991 年的报告提出，好工作将越来越依赖于能够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的人，即后工业社会需要“灵活的专家”，其需具备三个属性，首先，需具备将专业技能应用于广泛问题和生产过程的能力；其次，须比上世纪的产业工人和专业人员更具流动性；第三，还需要坚持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

高等教育即大学课程必须强调符号技能、研究技能和交流技能，以培养能够适应快速变化和全球竞争的劳动力。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支持跨学科项目的概念，这些项目侧重于实质性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学科范式和知识创新。

后工业发展战略的第二个空白是“创新鸿沟”，这是源于大学、政府和产业之间的科学分工。历史上，美国形成的科学分工是：大学进行基础研究或纯研究，联邦实验室进行应用研究，企业从事新产品和新工艺开发。但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被分隔后，彼此的文化也被分隔，即基础研究不考虑实际应用，那么从基础研究到联邦实验室，再到工业实验室和商业化之前，就会出现较长时间延迟。然而，国际竞争所给的压力是给创新体系加入了时间维度

的竞争；问题不是产生多少新知识，而是知识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速度有多快。

择优发展战略的形成

一方面是高等教育需要基本的制度重组。美国高等教育在财政环境变化下，经历了战后的扩张以及与以往短期周期性短缺所不同的结构性财政危机之后，急需制度的重组。

另一方面，企业对高等教育政策也提出了要求。随着高等教育成为美国经济政策辩论的焦点，企业要求高等教育政策必须与企业所重新获得的且具有竞争优势的目标相联系。除此之外，择优发展战略的核心也由此产生：即各个机构要明确自身使命，专注于优势专业领域或市场需求量高的领域，同时对相对弱的学术项目和学生需求量低的领域进行资源重新分配。

择优发展战略和跨学科活动的实施

首先，区分机构使命。高等教育通过专注于机构的优势专业领域或市场需求高的领域来塑造自身使命，采取择优发展战略。

其次，重组项目和研究领域。通过教师自然减员或取消项目，重新分配财政资源和教师队伍，以保持较少学术领域的项目质量。

第三，推动跨学科研究。美国政府正在改变研究支持的结构和标准，鼓励大学采取更具选择性的策略，以消除过剩的研究能力，并与附近的机构合作共享教学和研究设施。在重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多学科支持的项目更容易成为择优发展的目标项目，因为研究中心等跨学科小型组织能够更充分利用自由，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同时，更容易与政府和企业建立联系，缩短学术界与工业界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马萨诸塞州的案例研究

1988−1992 年马萨诸塞州经历了财政危机，对公共高等教育拨款减少，同时因产业重组导致大量失业，经济崩溃，公共高等教育系统面临财政和资源的双重压力。1988 年开始的全州财政危机导致州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的拨款累计减少，到 1992 年已超过 26%。公立高等教育的支出从 1988 财年占州预算的 6.5%下降到 1992 财年的 3.0%。尽管随后几年恢复了一些资金，但 1996 财年该州 29 所公立学院和大学的支出仍将低于 1988 财年。该州经济核心的基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重组引发了更大的财政危机：计算机和软件、国防、医疗保健和金融。1988 年至 1992 年间，马萨诸塞州失去了 331,000 个非农业工作岗位，占其总就业人数

的 11%。这是自大萧条以来马萨诸塞州最大的一次失业。在此背景下，马萨诸塞州通过择优发展战略来解决财政危机。

1989 年，马萨诸塞大学未来委员会制定了重组大学系统的蓝图。该委员会由加州大学前校长 David Saxon 担任主席，由马萨诸塞大学董事会创建，旨在争取增加对大学的资助。该委员会(1989)接受了其职责，并建议马萨诸塞州“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公立大学”（build a world-class public university），首先将该州的五个大学级校区合并为一所马萨诸塞大学。在承诺重新提高财政效率而不是增加资金的情况下，一个拥有五个校区的马萨诸塞大学系统于 1991 年 9 月成立。

马萨诸塞大学通过一系列改革，包括校区整合、人员裁减、确定一流中心等，重新分配资源，促进教师流动和远程学习。系统重组整个公立高等教育体系。通过择优发展战略来实现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1992 年，董事会成立了一个公共政策工作组（1992 年），并启动了广泛的规划过程。董事会指出，马萨诸塞大学的长期目标是通过更新大学与州的伙伴关系和建立大学与企业的伙伴关系，争取世界一流地位（World class status）。根据规划，每个校园的都有自己的一流中心，结合自己的优势实现择优发展，从而保证在系统内提高效率。阿默斯特校区被指定为该系统的传统研究型大学，发展各个领域的博士学位项目。1995 年 2 月，校长 Michael Hooker（1992-1995 年任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system 校长）发布了“2000 年行动计划”，旨在实施系统和每个校区采用的战略计划(Hooker 1995)。2000 年行动计划的目标是提供一流的教育（First rate education），“以确保该州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同时，各个校区必须提供文件，证明其已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将其基本预算的 3%重新分配给指定的择优发展领域。

结论

美国大学对财政危机的回应，以及州和联邦的政策举措，正在推动综合性大学进行四项相互关联的结构性改革：（1）从机构模仿转向差异化，（2）从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和开发，（3）转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以及（4）从基于院系的研究活动转向中心和研究所等有组织的研究单位。马萨诸塞州公立高等教育的转型是在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压力下进行的，这场危机比大多数州所遭遇的危机更深、更持久。然而，在这方面，它的轨迹为美国高等教育描绘了一条道路。尽管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扩大其在州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大多数州立机构和许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仍然深陷结构性财政危机。虽然对于单个

机构和教职员工来说，实现这一目标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多元化大学所存在的明显矛盾正在通过择优发展战略在系统层面得到解决。

（来源：里瑟琦科教观察微信公众号）

国际一流大学学科交叉课程设置的探究与启示——以统计学与神经科学的学科交叉为例 | 邓欣依

内容摘要：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驱动下，多学科交叉创新正成为科技突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推进力量，而学科的交叉融合正是高校自主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显著优势。本文选取了 U.S.News 2022—2023 排名前十的国外高校，通过梳理统计学与神经科学的学科交叉课程，具体包括培养目标、授课内容、课程组织形式、学时、师资和教学方法等信息，总结归纳其课程设置特点，以期为我国高校构建多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学科交叉，课程设置，统计学，神经科学

（《高等理科教育》2024 年第 5 期）

国际比较视野下大学文科教育的困境与路径 | 张欣琪 刘业青 林杰

摘要：文科教育受到多方利益群体的关注，“文科生太多了”成为热议焦点。规模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文科就业难、收益低的现实症结。通过多国比较发现，该争议实质在于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而非表面的规模问题，体现为文科专业内部结构规划欠缺合理性以及文科教育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发展困境。因此，国家需要优化调整学科结构，分类发展文科专业，企业应全面评估文科生能力并与文科教育密切联系，大学以核心素养为人才培养目标，深化新文科教育改革，个体理解并尊重学科差异，多主体协同推进文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文科生规模，文科教育，结构性问题，国际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文科生是否太多了？”备受热议。2021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题为《关

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认为文科生过多是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经济论坛上指出，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设置之间的脱节导致了文科生供过于求。2023 年，教育部发布的《2022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包括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日语等在内的多个文科专业遭到高校撤销。在国际上，多国政府在推动教育政策调整时，强调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如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要求国立大学调整专业设置以更好地响应社会需求，英国教育大臣尼基·摩根（Nicky Morgan）和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等同样推崇 STEM，文科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仅削减文科生的数量可能无法根本解决上述教育或社会问题，数量是问题的表象，需要深入地思考和应对文科教育在发展中遭遇的困境。

二、“文科生太多了”的表现与实质

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对“文科生太多了”的担忧。这种观点外在表现为市场就业需求的波动对文科毕业生构成挑战；内在表现为文科专业的回报往往难达预期。究其原因，文科生规模争议的实质源于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

（一）“文科生太多了”的表现

1. 就业难：市场的实用导向增加文科求职压力。从就业趋势分析，市场对实用学科毕业生的需求倾向导致本科生就业出现差异化。美国联邦劳工统计局预测，到 2029 年，在计算机等相关职业需求推动下，STEM 职业岗位将增长约 8%，比其他职业岗位增幅的平均水平快两倍多。当前，主要国家的就业数据表明：相对于文科部分专业就业低迷，STEM 学科本

表 1　主要国家不同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专业领域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英国
教育学	87.7	98.5	89.6	93.4	88.0
艺术与人文学	83.6	92.1	53.5		84.0
社会科学		93.7	71.8		85.0
法学	77.7	97.2	84.5	91.4	83.0
商业与管理	86.9	96.8	84.5	93.9	83.0
自然科学与数学	86.0	96.8	69.8	98.0	84.0
工程学	89.4	99.8	89.2		87.0
农业	87.8	96.3	82.1	93.2	86.0
健康与医疗	84.6	99.6	95.6	98.2	95.0
平均就业率	85.5	96.8	80.1	94.7	86. 1

注：1. 空格代表无数据。2. 鉴于国家之间学科和专业划分存在差异，研究者在综合比较多国的数据后，重新对专业领域进行命名，尽量形成直观的比较结果。3. 根据麦可思就业蓝皮书 2024、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官网、澳大利亚学习和教学质量指数（QILT）、日本大学通信网站及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整理自制表格。

科生就业情况多优于毕业生的平均就业水平。（见表 1）这反映出 STEM 学科领域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较强的竞争力，数据差异与专业技能需求和行业发展态势有关。在非 STEM 学科方面，如教育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等，各国的就业率呈现出明显差异。如在艺术与人文学科领域，澳大利亚的就业率为 53.5%，而中国的数据为 83.6%。同一国家的非 STEM 学科的就业率也存在差异。如中国的教育学就业率为 87.7%，而法学为 77.7%。这说明不同国家在非 STEM 学科领域的发展状况、市场需求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

文科专业的平均就业率通常低于总体平均水平，表明文科毕业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难度，文科专业内部亦存在显著异质性。近十年 OECD 国家文科生的招生比例浮动基本保持在 5%之内，而实用导向的偏好会导致文科专业中的某些领域面临相对较大的就业挑战。如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管理学和教育学的就业前景相对乐观，但人文学科极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这与学科培养方式有关，实用学科更侧重于技能培养，增加了毕业生就业稳定性并降低可替代性，从而失业率较低。如美国机械和精密技术等专业毕业生失业率较低（2.1%），反映出该领域毕业生在市场上具有较高需求。相比之下，美术、哲学和大众传媒等文科专业的失业率较高。

2. 收益低：隐性的文科价值难以满足求职期待。文科专业往往因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相对较低而失去被优先选择的机会，导致文科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澳大利亚的调查显示，基于经济理性，约 85%的本科生及其家长在选择专业时主要考虑就业因素。当下，文科毕业生沦为“高学历穷人”。教育投资的回报在不同专业间存在显著差异。道格拉斯·韦伯（Douglas Webber）基于美国青年数据，得出理工科与文科平均收入的中位数存在明显差距，被调查者中两类学科最高收入相差近 30 万美元的结论。特别是在高教育成本的背景下，文科专业的盈亏平衡年龄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从而增加投资回报的风险。

不同学科本科毕业生的相对年收入呈现出较大差异，特别是工程类和通信类专业的毕业生相对年收入普遍较高。（见表 2）以德国为例，这一领域毕业生相对年收入高出其他专业500~12000 欧元不等。而文科专业的毕业生相对年收入普遍较低。如教育学和艺术与人文学科等专业的毕业生相对年收入多处于平均值以下。因此，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薪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凸显了文科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极大的经济挑战，以及关注文科教育和市场适应性的重要性。

表2　世界主要国家本科毕业生平均年收入

专业领域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德国（€）	日本（日元）	英国（£）
教育学	60 024	62 205	75 000	39 665	209 400	28 000
艺术与人文学	66 672		59 500	34 594	209 000	24 900
社会科学	67 692	69 802	69 400	37 905	201 500	29 998
商业与管理	73 056	63 907	69 200	41 517	207 300	27 990
自然科学与数学	71 568	71 080	69 000	40 364	227 200	31 888
信息与通信技术	80 508	74 778	74 400	45 709	218 100	
工程学		76 736	75 000	46 291	216 700	30 998
农业	68 172	61 399	71 100			26 365
健康与医疗	65 280		85 000		206 900	34 950
平均年收入	69 122	68 558	72 060	40 864	212 013	29 386

注：1. 空格代表无数据。2. 鉴于国家之间学科和专业划分存在差异，研究者在综合比较多国的数据后，重新对专业领域进行命名，尽量形成直观的比较结果。3. 根据麦可思研究院 2024 年版《就业蓝皮书》、美国全国大学与雇主协会（NACE）官网、澳大利亚学习和教学质量指数（QILT）、德国 Absolventa 网站、日本厚生劳动省官网及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整理自制表格。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在市场需求和经济期待的现实驱动下，许多文科生被迫或主动地滞留在就业市场中，进而造成“文科生太多了”的表象。

（二）“文科生太多了”的实质

基于社会各方对“文科生太多了”的争议，以及文科生表现的就业难及文科教育收益低等现象，该争议的症结可归为两点。一是将文科生数量的多寡直接与经济发展挂钩，忽略了教育多样性和社会文化需求的重要性。不同学科的教育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片面地从经济角度评价文科教育的价值进而评价文科生数量，忽略了文科生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贡献。二是过度简化文科规模规划的复杂性，仅仅将就业结果视为规模调整的单一因素。调整学科专业规模是一项复杂的决策，涉及学科质量、学生需求、战略规划等因素，不仅要考虑外部需求，还应基于对学科发展的预期及学科自身价值与学校愿景的匹配程度。

文科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暴露出教育系统的人才供给量与社会市场需求不平衡，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完全匹配问题。因此，面对“文科生太多了”的争议时，首先要明确其指涉的是文科的规模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从规模上来讲，中国的文科生数量并非“异常状态”。近十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本科生中文科生占比普遍超过 50%，美国和日本占比甚至超过了 60%。（见表 3）中国的文科生比例并没有超过其他国家的平均值，而且文科生与理科生比例大体持平。因此，“文科生太多了”并非简单的文科生数量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文科教育结构性问题。

表 3　世界主要国家本科生中文科生占比（%）

年份	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2013 年	50.8	63.9	55.6	60.4	56.1	64.5	54.8
2014 年	50.9	62.7	55.3	61.4	55.8	64.1	54.2
2015 年	50.8	61.6	58.7	62.1	55.6	66.1	55.9
2016 年	50.8	60.7	57.5	60.1	55.5	66.0	55.8
2017 年	49.2	59.9	56.2	60.7	55.6	66.8	56.0
2018 年	50.4	59.3	54.7	59.8	55.5	66.5	55.5
2019 年	50.3	58.5	54.0	60.2	55.6	66.4	56.3
2020 年	50.2	57.8	53.4	60.0	56.2	65.9	61.7
2021 年	49.6	59.2	52.2	57.7	56.3	65.7	60.1
2022 年	49.2	57.7	52.0	56.9	56.2	65.7	58.5
平均值	50.2	60.1	55.0	59.9	55.8	65.8	56.9

注：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官网、美国国家数据统计中心（NCES）、OECD 数据库官网、日本文部科学省官网、澳大利亚大学协会官网及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自制表格。

三、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

对“文科生太多了”的感知源于文科生遭遇的就业难题，以及公众对文科教育价值的持续质疑，这揭示了文科教育与大学发展、市场需求、国家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向当前文科教育的发展困境。

（一）文科专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缺乏合理性规划

大学在调整文科专业结构时，应基于多元因素的综合考虑，坚持统筹兼顾原则，注重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文科教育的长期发展。同时，文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在一定限度内是合理的，但若仅仅将单一因素作为专业结构调整的标准，缺少稳定性的专业发展长期规划，势必会影响学科建设。在实践中，文科专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常因缺乏合理规划而导致文科教育发展受限。

首先，文科专业因其相对较低的门槛和灵活性得以大量增设，但未能充分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教育质量等因素，导致文科生的人力资本错配和低效的教育投资。如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文科在校生比重持

续偏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但学科设置滞后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同时，在追求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存在新设学科缺乏特色、设置随意性强且盲目性大，缺乏宏观调控和规划等学科设置乱象。OECD国家 1991—2020 年的数据分析显示，单纯扩张文科专业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同时，并非所有个体都适合偏向学术性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错配不但会削弱扩招带来的经济效益，还会影响到文科教育为雇主提供信号的可靠性，文科生在就业市场处于不利环境的风险增加。

其次，量化主导的评价方式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影响着资源分配和管理，文科因其贡献难以直接量化而逐渐被边缘化。学术界在追求投资回报率、提升机构排名和声誉的过程中，往往强调出版物的数量，而忽视了文科教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自然科学因其易于量化和标准化在评价体系中占据优势，文科教育则因其难以量化的特性而遭受冷落。这不仅未能准确反映文科教育质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传统文科的教学、研究和服务职能。通过分析多个大学排名框架发现，有 12 项排名的科研类指标权重超过 50%，有 6 项权重甚至高达 80%，但科研类指标主要以成果和效率为衡量标准，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在排名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最后，知识和技术创新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驱动作用需要得到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与经济紧密相连。一些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文科专业被边缘化或裁撤，而那些具有较高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的理工类学科，如人工智能和工程学被优先重视和发展，其职位需求增长速度远超过传统文科领域，文科生找到与其专业相匹配的工作面临更大挑战。同时，各大学开始逐渐缩减文科结构。如日本政府自 2004 年左右开始实施重视产业竞争力的大学政策，大学接受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理念，形成默会的社会观念：文科教育无助于就业且无法赚钱，因而无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发布的《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报告指出，在 2005—2011 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对人文领域的资助比例从 30%下降到了 20%，而对 STEM 领域的支持则一直维持在 60%到 70%。不均衡的资源分配无疑加剧了文科教育的困境。

（二）传统文科培养目标难以匹配市场需求变动

社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正重塑文科教育的目标，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增加对跨学科技能和应用型文科人才的需求。这对文科生培养提出更高标准，即文科生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知识，

更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力和社会责任，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解决面临的各类问题。然而，当前文科教育存在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导致大量文科生难以在市场中觅得心仪去处。

首先，在当前劳动市场中，技能导向型人才需求正逐渐成为雇主的普遍偏好，这种需求往往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显著效果。在全球范围内，文科学位数量在减少的同时 STEM 领域的学位数量却在持续增长，反映了社会对于应用型知识和技能需求的转变。同时，从跨学科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理工科在跨学科研究与应用方面表现出更强实力。理工科领域的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如生物信息学等跨学科领域不断涌现。但文科教育并非产出应用成果，而是更多聚焦于学生社会服务能力的培养和个人成长。在市场化日益深化的学术环境中，价值增值被狭隘地等同于商业化，导致对大学学科的评价过分强调经济视角，忽视文科教育广泛的社会影响。相较于理工科，文科的社会效益更加分散且难以量化，其价值在短期内难以显现。

其次，数字化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综合性。在数字化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企业更加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型人才。如历史学、哲学等传统文科专业侧重于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类专业毕业生在数字化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需要较强分析能力和技术知识的新职位正在增加，一些传统文科职业，如市场研究员和文案撰写者等正面临被自动化工具替代的风险。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9 年，与文档处理相关的工作岗位将减少 41%。因此，数字化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加剧，对传统文科职业的替代风险也在逐步上升，这要求文科生在掌握传统知识的同时，还需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最后，文科生的培养过程常常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这种“悬浮”状态归因于传统文科教育未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快速变化。既有的教学模式往往将学生的知识需求视为一个静态变量，未能有效地适应社会变迁和技术发展的步伐。在全球化的复杂社会中，面临的问题往往超越传统学科界限，其解决方案需要跨学科的整合。然而，许多毕业生在接受文科教育时并未形成跨学科意识和能力，在实践中自然也无法很好地综合不同学科知识。高等教育体系过度细化，削弱了学科间联系，使得文科生在市场对综合型人才高需求的情况下，难以仅凭单一领域知识和技能满足要求。此外，文科生也缺乏充分的就业指导，使其在理论到就业的过渡中遇到困难。相比之下，理科生受益于预先确定的职业进入路线和更积极的劳

动力市场结果，容易形成明确的职业认同和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文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

四、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涉及多元主体，因此，可通过协同国家、市场、大学和个体等多主体的力量以应对文科教育的发展困境。

（一）国家层面：优化调整学科结构,分类发展文科专业

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竞争中，国家在整体学科布局上合理有序的统筹规划至关重要。交叉学科等各种不同分类下的学科布局的合理性，不仅关系到科技创新，还直接影响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中国为例，2023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教育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动态调整高等教育学科布局，如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设立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专业等。不同于我国的直接统筹学科布局，美国政府作为外部力量，通过美国联邦教育部发布学科专业分类目录，侧重于管理上的统计功能和调查信息标准，发挥着构建学科体系、规范办学行为、指导评估工作和辅助决策制定等多重作用。因此，我国可依据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产业结构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对学科布局进行调整和优化，进而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赋能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为确保文科教育能够综合发展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需要从政策层面提供坚实的支持。这包括建立专门机构并提供经济资助，以支持文科发展和创新。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作为英国研究与创新组织的一部分，专注于资助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并提供详尽的文科发展项目申请指南，涵盖了人类学、电影和媒体研究以及数字人文等多个文科专业领域，旨在推动学术研究、跨学科合作及知识创新。该机构专注于文科教育的特定需求，不仅确保了艺术和人文学科获得必要的资源和关注，而且强调研究质量和影响力、支持长期学术探索、增强教育与公众参与以及保护文科研究多样性，提升了文科社会地位和学术价值，有助于推动不同学科间的交流。

文科学科的内部布局调整需要考虑到文科各学科之间的差异，充分发展各专业以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对于应用性强的专业，应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以便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如日本新兴文科领域侧重于实际应用价值，如咨询管理等专业展现更强的就业竞争力。对于那些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专业，如文化保护等领域，政府应提供适当支持，吸引和保留专业人才以满足社会长期发展的多元需求，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同

时，关注文科领域内专业发展的差异性。在美国，从 1987 年到 2018 年，传统文科如历史等专业学生比例下降约 20%的同时，性别研究等新兴领域学生比例增长了 5 倍，这表明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等问题的关注。文科专业调整应关注差异性，分类发展以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此外，文科专业发展规划还应考虑国家特色，针对性地保护边缘化但具有传承价值的学科。

（二）市场层面：全面评估毕业生能力，加强企业与文科专业的联系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职业环境中，企业和组织应更加关注毕业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专业技能之外，包括沟通能力、团队协作、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考等在内的软技能。美国的职场基本素养达成秘书委员会（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研究报告提出工作技能指标体系，不仅涵盖工作中的技术性和操作性要求，还包括了与文科相关的广泛能力，如在伦理和道德关怀等领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文科生通常在这些软技能方面具备优势，不仅提高了文科生在多样化职业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也提高其在职场上的不可替代性。多数商界领袖认为分析问题和人际沟通等技能与文科紧密相关。因此，对求职者的全面考察有助于削弱学科差异带来的壁垒，关注学生个体素养。

为提升文科教育的质量和市场适应性，大学需加强与企业和组织的紧密合作，确保教学内容可适应市场需求，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和公共宣传有效地提升文科专业的社会认知。此外，支持和鼓励文科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对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探究精神至关重要。在创新驱动的经济中，文科专业如哲学对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等至关重要，这些技能正是推动创新和创意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与文科专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可以开拓诸如内容创作和用户体验研究等新兴就业领域，是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017 年硅谷指数显示，尽管创新与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占比（27%）未达预期，但社区和商业基础设施（52%）与服务领域（17%）显著的就业人数占比，凸显了金融、法律和咨询等服务人才对硅谷发展的关键作用。

（三）大学层面：以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深化新文科教育改革

文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才，核心在于提升人的核心素养，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被技术至上和功利主义思潮裹挟。文科教育应当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塑造学生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质，培养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复合型人才。哈佛大学在 2022—2023 学年提供美学、伦理学、技术等多种课程，深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科技的理解，有助于培

养能够适应快速变化世界和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才。同时，文科的复杂性、价值性和非累积性需要全面而细致的评价体系来准确衡量文科专业人才的发展水平，既要审视最终学术成果，又要关注学习过程和学生在过程中的成长。以牛津大学跨学科专业——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为例，其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综合了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和增值评价，运用入学考试、学年末考试、毕业考试等多重方式来评定学生的学习。采用多元化的评价主体与标准能更全面展现学生的发展。

为促进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9 年，教育部等 13 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在 2017 年提出，强调将新技术融入文科课程，进行专业重组。中国的新文科内涵要大于美国新文科，源于新技术推动、新需求产生及新国情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其核心在于加强实践教学与跨学科学习，避免学科单一化导致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就业竞争力，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以更好地从学校过渡到市场。但在跨学科时，大学必须认识到文科的独特价值，避免将其视为自然学科的补充或备选方案，应强化其主导作用从而降低学科从属的风险，需考虑到不同学科间的门槛差异，并据此合理配置资源。

建立科学包容的评价体系，超越简单的量化指标，深入理解和评价文科教育在社会和人文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当前评价体系过于倚重论文数量、引用率等形式指标，过分强调短期、可量化成果，采用简化的投入–产出模式，对文科教育的长远价值认识不足，反映了评估体系的局限性，传统的科研评估方法难以全面把握这些学科的特性和社会贡献。因此，评价文科的发展需要更为复杂和适切的方法，捕捉到这些学科的复杂性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学术界正在探索新的评估途径，有学者以欧洲大学为背景，提出了一个包含科学、社会和政治等维度的评估框架，以更全面地捕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多元影响。这表明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能够全面反映文科价值的评价体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四）个体层面：辩证看待学科差异，综合多因素选择专业方向

学生、家长和其他相关利益个体应秉持包容的学科差异观念，辩证看待学科之间在某些维度下的差异，自觉规避学科间的偏见。有观点将知识划分为“实用的”和“装饰的”两种，应用性学科归属于实用性知识，而文科往往被视为装饰性知识，因此断定文科不如其他学科。这种简单二分法限于特定职业技能，忽略培养个体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等特征。各学科有其

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发展规律，不能简单用成本效益来衡量，市场逻辑不应成为学科建设的唯一标准，避免个体陷入“功利主义”和“数字至上”的误区。个体应辩证看待学科间的差异，认识到不同学科在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社会贡献等方面的独特性，切勿因学科之间不同的标准产生学科刻板印象。学科并无优劣之分，没有学科可以单独存在。理解学科互补性和交叉融合的重要性，尊重学科的专业性，避免形成过于浅薄的认识。

个体专业选择应寻求个人志向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受短期就业趋势或他人期望的影响。大学专业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决策过程，涉及个人兴趣、家庭和重要人际关系等内在因素，及经济社会环境、行业发展前景和专业声誉等外部因素。伊莱恩·布里昂斯（Elaine Briones）对在菲律宾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个人兴趣和选择是影响专业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学校声誉和教育质量、就业前景等。在中国，不同因素的优先次序存在差异，家庭的重要性会被放大。阳韬基于中国高考报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影响学生专业选择。而家庭文化背景虽然不直接决定学生专业选择，但在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会显著影响学生专业偏好。因此，个体在进行学科选择时，应避免过度放大单一因素的负面影响而形成专业选择与学科认知，全面了解不同学科信息，关注国家与市场和学科之间的联系，充分了解大学学科发展和制度规则，综合各类信息后做出最佳选择。

（《中国高教研究》2024 年第 11 期）

国外高端教育学术社团赋能博士教育发展研究及启示——以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为例 | 耿有权 李洪燕 张译丹

摘要：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EUA-CDE）是欧洲博士教育领域最大的区域组织。它以博士教育研究为核心，以促进欧洲博士教育研究和培训的发展进步、提升欧洲博士教育质量为使命，成为欧洲博士教育的智囊团。EUA-CDE 通过年会、博士辩论、专题同行小组、研讨会、国际合作项目等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其博士研究生教育研究智库的作用，为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交流和特色博士研究生教育智库建设提供启示：重视博士教育智库作用，完善智库研究方法；参与全球合作网络，推动博士教育研究国际化；完善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学术交流与共享。

关键词：高端教育学术社团，博士教育，欧洲大学协会博士教育理事会

（《教育探索》2024 年第 1 期）

民主与科层：北欧高校学院学术治理结构和模式——基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案例比较 | 余利川

摘要：北欧高校学院学术治理内嵌学术民主与行政科层的基本形态，前者维护学术共识的合适逻辑而后者遵循组织理性逻辑，两者彼此的作用逻辑决定治理结构的共性、差异与模式。通过案例比较发现，在组织架构、成员遴选、席位分配与权责范围四个维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学院学术治理呈现“上小下大”组织、基层选举居主导、教师与学生为主体、统合学术与行政的结构共性，以及组织架构多元化、内部群体式任命、成员占比不趋同、有限的权责约定的结构差异。在回应如何定位、怎样参与、谁来治理与治理什么四个问题时，归纳出学术服务行政与学科聚合领导、自下而上选举与基于选举任命、多方主体协商与内部人员自主以及限定学术事务与收缩式放权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北欧高校，学院学术治理，学术民主，行政科层

（《比较教育研究》2024 年 9 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4 年第 7 期
第 1 卷第 7 期·总第 7 期
2024 年 11 月 22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